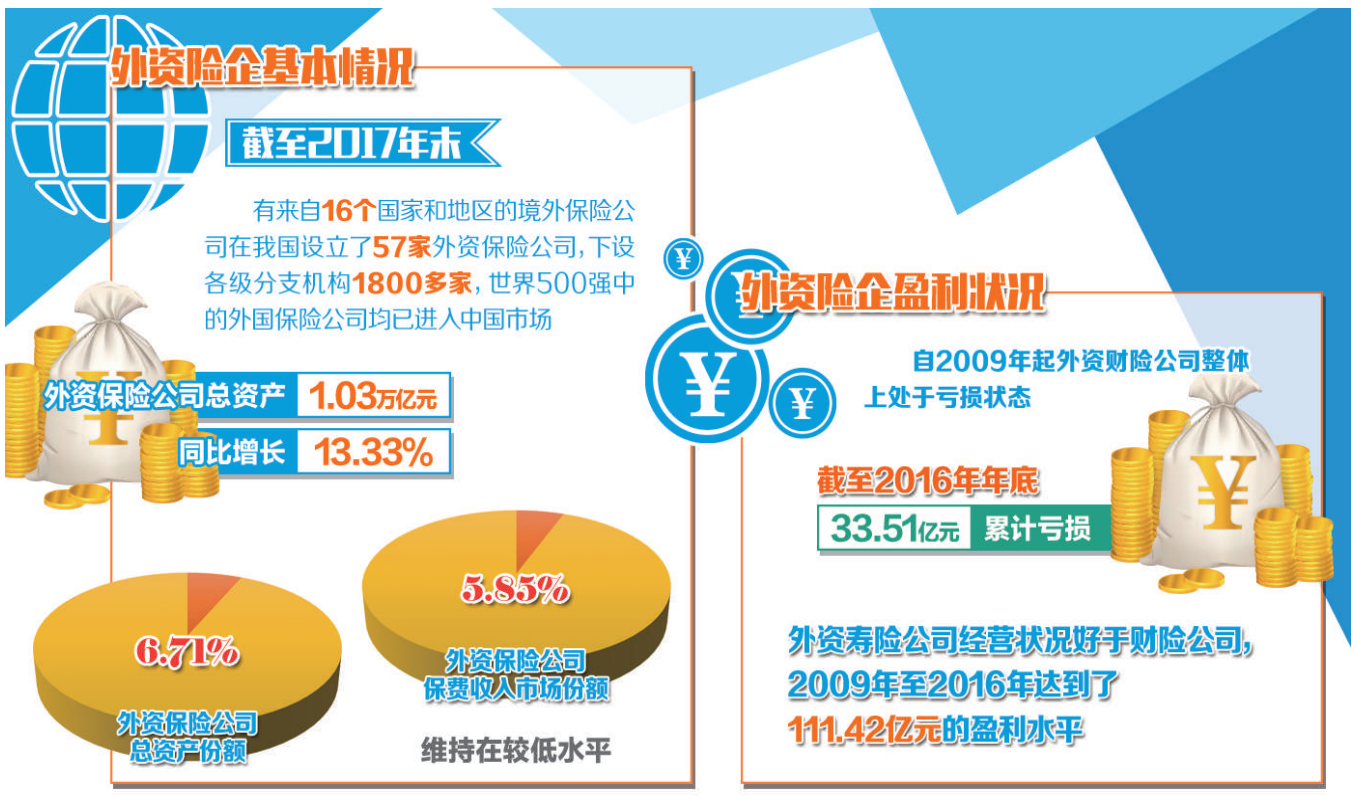
保险行业开放政策渐次落地

外资将面临“本土化”考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晨阳

热点聚焦

伴随保险行业扩大开放的政策不断落地，不少外资险企争相入局。这有助于促使我国保险市场更加成熟，进而提高内地保险市场的规模与效益，中国险企也将在竞争与合作中与国际同行接轨。外资险企在产品设计、服务水平、经营理念、技术经验等方面的优势不言而喻。不过，面对发展壮大的国内大型保险机构，外资险企想要在中国保险市场分一杯羹也并非易事



“在中资银行业和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外资机构的市场份额却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近日公开表示，一方面，银行业和保险业需要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中资机构“走出去”要求实施内外一致的金融制度，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

事实上，今年4月份中国银保监会已下发规定，将外资人身险公司外方股比放宽至51%，3年后将不再设限；同时，放开了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并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2年代表处要求。此外，被称为外资保险公司“基本法”的《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近期也将启动修订工作。

外资排队入场

伴随保险行业扩大开放的政策不断落地，不少外资险企争相入局。

4月27日，上海保监局对英国韦莱集团控股的韦莱保险经纪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申请进行了审核批准。这意味着，中国银保监会有关保险中介行业扩大开放举措在上海正式落地。韦莱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成为全国首家获准扩展经营范围的外资保险经纪机构。

5月2日，中国银保监会正式批准工银安盛人寿发起筹建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这是中国提出加快保险业开放进程以来，获批的第一家合资资管公司。据悉，工银安盛人寿由中国工商银行、法国安盛集团和中国五矿集团公司3家中外股东于2012年合资成立。

紧接着，5月4日，富卫人寿保险（百慕大）公司等向中国银保监会提交了筹建富卫人寿保险公司的申请材料。富卫人寿保险（百慕大）公司为瑞士再保险、盈科拓展集团等持股的富卫集团全资子公司。据消息人士透露，富卫人寿保险公司有望成为我国扩大保险业对外开放后获批的第一家持股比例达到51%的合资人身险公司。

纷至沓来的外资险企，将给国内保险市场和保险公司带来哪些变化？业内专家指出，国内保险公司与外资险企两者既竞争又合作，有助于促使我国保险市场更加成熟，进而提高内地保险市场的规模与效益。业内认为，经过一段时间发展，目前部分国内大型险企已经进入世界大规模保险公司行列，其经营管理模式也得到了国际的认可，具有了和国际同行同台竞争的能力。

助力行业向好

当下，“引进来”的理念和方式，对中国保险业明确下一步发展方向和路径，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首先，外资保险公司专业化运营方式及百余年的市场化运行经验可以帮助优化国内保险市场环境；其次，多样化的中外资持股比例和公司治理结构促进提升决策效率。同时，外资保险公司先进的运营理念、产品设计、风险管控体系更高效地贯彻到日常经营中，也能为国内民众提供多样化的养老和健康风险解决方案。”业内人士分析称。

新华保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万峰认为，“在经营理念方面，外资险企价格高、费率高，但服务好。外资险企突出的不是卖保险，而是提供服务，这种经营理念值得中资险企学习；在产品特色方面，外资险企将自身定位为风险管理师，而许多中资险企将自身定位为理财师、财富管理师，理念上的差异也带来销售经营风格的不同。这反映出国内保险业对客户的风险管理不足”。

相较于国内保险机构看重保费规模而言，外资险企更关注新业务价值和内含价值等业务衡量指标，以及合规和风险防控管理。随着中国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中国险企势必要在经营管理和抗风险能力上与国际同行接轨，而中外资合作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接下来，外资寿险业务将加快发展，它们的经营理念比较审慎，在长期保障型业务拓展方面比较有经验，这将促进我国寿险市场的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说。

此外，监管部门对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以及代理业务的放开，将会对国内保险中介市场带来深远影响。据介绍，此前中小型企业和个人是外资保险经纪公司营业对象的禁区，而围绕中小型企业和个人展开的保险业务，目前约占整个保险市场八九成以上的份额。现在放开经营范围限制，可以给国内企业和民众多样化投保选择，外资保险经纪公司将在境内保险市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规避“水土不服”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保险公司在我国设立了57家外资保险公司，下设各级分支机构1800多家，世界500强中的外国保险公司均已进入中国市场。不过，2017年外资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为2140.06亿元，市场份额仅占5.85%。

也就是说，外资险企规模并不小，但市场份额占比却很低。究其原因，万峰坦言，这主要受中资保险机构近几年理财产品超常规发展影响所致。如果减去理财产品的部分，外资险企的市场份额会上升。他还表示，随着严监管持续推进，以及市场进一步开放，保险行业会向以风险管理为主发展，外资保险公司的优势将逐步显现，市场占比或将攀升。

与国内保险行业相比，国外保险市场高度发达，包括产品设计、服务水平、经营理念、技术经验等方面的优势不言而喻。不过，面对经过发展壮大的国内大型保险机构，外资险企想要在中国保险市场分一杯羹并非易事。

比如，此次将外资人身险公司外方股比放宽至51%的政策调整，尽管让外资股东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主导权，但并非绝对主控权。由于目前外资独资控股寿险公司的限制还未完全放开，外资企业仍需以合资形式进入，中外股东在面对双方文化差异、经营理念不同、运作模式不尽相符等问题时，还需要进一步融合发展。对此，有市场分析指出，“外资需要‘本土化’改变，在技术研发、产品开发、管理模式等方面要通过调整才能真正适应中国市场的需求”。

可以预见，面对前景巨大的中国保险市场，无论中企还是外资，机遇与挑战并存。

银行结售汇顺差106亿美元

4月份外汇市场运行稳定

本报讯 记者李华林报道：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4月份，银行结汇9911亿元人民币，售汇9241亿元人民币，结售汇顺差669亿元人民币（等值106亿美元），4月份我国外汇市场运行保持稳定。

具体来看，1月份至4月份累计逆差76亿美元，近期外汇市场供求持续处于相对平衡状态。4月份企业等非银行部门涉外收支逆差99亿美元，1月份至4月份累计顺差8亿美元，今年以来相关市场主体的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均衡。其中，4月份涉外外汇收支顺差9亿美元。4月份我国外汇储备余额有所下降，主要受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回调等因素影响，外汇市场运行平稳。

“外汇市场供求主要项目继续呈现平稳有序态势。”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表示，首先，货物贸易仍是主要的外汇供给项目，4月份企业等非银行部门货物贸易结售汇顺差306亿美元，环比增长84%，与海关进出口差额及其变动趋势大体一致。其次，资本和金融账户结售汇基本平衡、略有盈余。4月份，非银行部门资本和金融账户结售汇顺差23亿美元，环比下降42%。此外，企业、个人等服务贸易结售汇逆差稳中有降，4月份为178亿美元，环比下降19%，同比略降2%。其中，个人购汇规模保持平稳。4月份远期结汇和售汇签约额同比分别增长1.6倍和3.1倍，远期结售汇签约顺差50亿美元，显示企业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下，汇率避险意识明显提升。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表示，4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美元汇率、利率均有所走高，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压力增加，但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形势保持稳定，说明我国经济基本面发挥了稳定外汇市场预期的根本性作用。在国内经济持续平稳运行的基础上，我国外汇市场将能够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总体延续合理均衡的跨境资金流动格局。

实缴规模达11.1万亿元

私募基金成第三大机构投资者

本报北京5月21日讯 记者周琳报道：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在日前举行的2018年全球私募基金西湖峰会上表示，截至去年底，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数量达到22446家，已备案私募基金实缴规模达到11.1万亿元，私募基金已经成为继公募基金、保险基金之后第三大机构投资者。

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私募基金年化增长率分别为64.4%和95.3%。其中，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8467家，实缴规模为2.6万亿元，年化增长率分别为79.2%和78.1%。各类私募基金持有A股市值达到9735.16亿元，占A股总市值的1.72%，

洪磊认为，在看到成绩之余，也不能忽视“短板”，“中国私募基金的资金来源中，来自各类养老金、社会公益基金、保险资金、主权财富基金等长周期配置资产的比例不足1%，而在美国，这个比例超过40%”。

4月份互金行业融资热度上升

分布在区块链、借贷和外围服务等领域

本报讯 记者钱箐旎报道：据网贷之家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2018年4月份全球互联网金融行业共发生58例融资，总融资金额约为243.1亿元；其中国内26例融资，总金额为192.7亿元；国外32例融资，总金额为50.4亿元。

4月份互联网金融业国内融资热度大幅回温，虽然案例发生数量有所下降，但总融资金额出现大幅度上升。从行业分布来看，4月份国内投资热点主要分布在区块链、借贷和外围服务等领域。其中区块链行业共发生10例，大都由数字货币交易所、投资分析平台、数字资产钱包平台获得。从地区分布上看，获得融资的平台主要分布在北京、广东；融资轮次主要集中在天使轮和C轮。

国企杠杆率为何居高不下

章言改

财经观察

□ 国企改革已历经多年，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但整体而言，国企的市场化程度要低于民营企业，具有明显的预算软约束特征

□ 从产业链上看，上游、中游行业的资金需求整体要高于下游行业，这些重资本行业里国企占比高，也导致了国企的高负债

5月1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并对国企去杠杆提出要求。这是一个多月以来，中央有关会议第二次就国企降负债和去杠杆作出部署。今年4月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到结构性去杠杆，明确了国有企业是加快降杠杆的主体之一，要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

近几年，去杠杆、减负债是国企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任务。国资委数据显示，2017年末中央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6.3%，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而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5%。从财政部公布的数据看，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1640767.8亿元，同比增长9.6%；负债总额为1065725亿元，同比增长8.7%；按此计算最新的国有企业负债率为65%，仍处于高位。在这一轮去杠杆过程中，国企和非国企的杠杆率继续分化。

为何国有企业的杠杆率高于非国企，而且去杠杆速度相对较慢？笔者认为，这是下述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城投公司承担了部分政府性融资职能，但这些企业所举借的债务纳入到了国企债务中。作为分税制改革的配套，1995年开始实施的旧《预算法》限制地方政府直接举债。在财政支出压力下，地方政府开始组建城投公司，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通过城投公司来融资和投资。

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要求剥离城投公司的政府性融资职能，划清城投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的界限。但在实际中，一些地方政府难以摆脱对城投公司的“依赖”，典型的如2017年财政部通报的地方政府通过城投违规举债的案例。

理论上，部分公共品应该由财政来提供，城投公司在其中承担了一些政府融资职能。但在计算各部门的杠杆率时，把城投公司这一特殊类型国企的债务，也纳入到了国企债务当中。在城投公司各类型债务中，仅城投债2017年年末的存量就高达7.1万亿元。如果将银行贷款、信托融资都考虑进去，城投公司的债务规模要庞大得多。

其次，国企预算软约束，相对而言更容易造成债务累积。国企改革已历经多年，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但整体而言，国企的市场化程度要低于民营企业，具有明显的预算软约束特征。预算软约束突出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经营决策易受政策干预，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稳增长成为政策重心时，如4万亿元投资计划期间大批钢铁、煤炭新项目上马。第二，对资金成本变化不敏感。国企在举借债务时，所考虑的因素除了成本外，还包括维持就业、落实地方产业政策等，2017年第二季度债券发行利率上升时，取消债券发行的民企比例要远高于国企。第三，一些国企经营效率较低，导致举借债务投资项目之后，可创造的利润相对而言较少，这意味着偿还债务的速度要慢于平均水平。

再次，从产业链上看，上游、中游行业的资金需求整体要高于下游行业，这些重资本行业里国企占比高，也导致了国企的高债务。比如钢铁、水泥、煤炭、化工这些行业的龙头多为国企，这些国企前期投资大，生产经营过程中也需要大量的现金备付，导致这些行业有较高的债务，进而推升了国企整体的杠杆率。

最后，各类型债务融资中，相对于民企，债权人对国企更为青睐，也为国企杠杆率居高不下创造了环境。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要有银行贷款、债券、信托、委托贷款以及融资租赁等。国企通过这些方式融资时，金融机构等债权人，都有地方政府会兜底的预期。而对于民企则保持谨慎，会从企业资质、所属行业等方面慎重考察。

由于地方政府兜底预期的存在，国企更容易获得外部的债务融资。加之前面提到的国企预算软约束、承担了一部分政府性投融资职能等因素，所以当经济面临较大稳增长压力时，国企杠杆率都会飙升，如2008年到2011年和2014年到2016年。

西安地税抓体制创新优化环境

让企业享受便捷服务

本报讯 记者雷婷报道：西安地税大企业局主要服务对象是营业收入达到一定规模的大型企业和分支机构较多的连锁企业。为尽量减轻大企业办税难负担，该局狠抓体制机制创新，促进税收环境不断优化。

2017年，该局已实现对凡涉及60项纳税人只跑一次的业务都能做到随来随办。今年2月份，该局对国家税务总局、省地税局新确定的134项“最多跑一次”事项清单逐项测试梳理，并将事项清单公布，广泛接受群众监督。该局还将过去集中管理前跑多个窗口、三五天都解决不了的涉税业务缩短为仅跑一次、半个小时办结，有的单笔业务办理实效甚至缩短至5分钟左右。

企业经营状况千差万别，税收生成各有不同，税收征缴同样需要个性化服务。为适应这一需求，西安地税大企业局专门为每一个企业配备了一名税收服务联络员，同时建设了“纳税人学堂”“纳税人之家”“纳税人权益保护中心”3个服务平台，接受企业各类涉税问题咨询达600余次，为26家企业解决了涉税难点问题。

本版编辑 孟 飞